

夜汲澄潭
瓶貯月
松茂篆書



★★★★
花园文丛

书前书后

——
来新夏书话续编

来新夏
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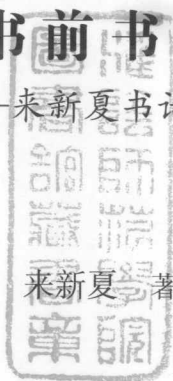
山西出版集团
三晋出版社

1315676

书前书后

——来新夏书话续编

来新夏 著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1315676



山西出版集团 ③ 三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书前书后: 来新夏书话续编 / 来新夏著. —太原: 三晋出版社, 2009. 7
(花园文丛)
ISBN 978-7-5457-0107-4

I. 书… II. 来… III. 图书学—文集 IV. G256.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19164号

书前书后: 来新夏书话续编

著 者: 来新夏

责任编辑: 张继红

助理编辑: 解 瑞

责任印制: 李佳音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三晋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4922268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 (综合办)

E - mail: sj@sxpmg.com

网 址: <http://sjs.sxpmg.com>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40千字

版 次: 2009年 8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09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7-0107-4

定 价: 3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出版说明

一九九八年，在读者圈中流行随笔热之际，本社（原名山西古籍出版社）组织出版了一套《当代学者文史丛谈》，反响甚好。其作者有谢兴尧、周劭、黄裳、邓云乡、陈诏、金性尧、来新夏、王春瑜、涂宗涛、宁宗一、林鹏，可谓极一时之选。如今，谢、周、金、邓诸师先后故去，其余诸师虽年过古稀，然皆活跃于学界，可称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最活跃者，当为来新夏师。

来先生为史界泰斗陈垣老的高足，治史六十余年，尤长于晚清民国史学及目录学、方志学的研究，著作等身。先生退居遼谷后，忽发豪兴，出版随笔集十余种，文史学界，声名远播。先生于本社所赐极多，令我等后生晚辈，感铭于心。

二〇〇八年，恰值《当代学者文史丛谈》出版后十年，偶向来

先生请教，谈及随笔出版，先生嘱曰，当今作随笔之少壮派，有王稼句、徐雁、伍立杨、刘绪源、苏华诸君，治学各有专长，著述甚丰，影其共同之处，读书多而杂，且善作书话，若将诸君书话各自出版一种，汇成一组，诚为佳话。

于是，我社遵先生之命，并由先生牵头，诚邀诸位先生，各出其近年新作书话，组成一套丛书，以传播知识为宗旨，期以报天下爱书人、读书人之厚爱。而以诸作者之文名论，亦可称极一时之选。

晋北塞上大同花园大饭店董事长刘海明先生，总经理刘东先生，昆仑饭店总经理刘昇先生，乃三晋企业界儒雅商者，热心于文事，钦佩诸君文名，乃慷慨为助，作成丛书出版。吾辈感先生之义，于是命丛书曰《花园文丛》。

此值丛书出版之际，特别说明出版原委，以表对来新夏先生等、刘海明先生等以及天下读者之谢忱！

三晋出版社

二〇〇九年八月

来新夏,一九二三年生,浙江萧山人。一九四六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。历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、校务委员、图书馆馆长、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、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主任等职。现任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所属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,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。二〇〇二年获美国图书馆员协会年度“杰出贡献奖”;所著《北洋军阀史》获第三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历史学二等奖;《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》获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成果奖著作一等奖。

主要学术著作有《清人笔记随录》、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》、《古典目录学》、《林则徐年谱新编》、《北洋军阀史》、《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》等三十余种。另有古籍整理著作及随笔集多种。



书前书后

纵横“三学”求真知

——访来新夏教授(代序)

◎来新夏 ◎夏 柯 刁培俊

○来先生,您好! 您是我们尊敬的学界前辈,学界称誉您为“纵横三学”的著名学者,大概也就是说,您在历史学、文献目录学、地方志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,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深远。您能谈谈您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概况吗?

◎好的,先谈谈我的本业历史学吧。我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大学生,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就读于辅仁大学,受过传统史学的科班训练。当时正是抗战时期,燕京关闭,北大成为伪大。辅仁作为德国教会学校,受日寇干扰较少,故而当时留在北京而不愿任伪职的学者纷纷加盟辅仁,一时名师云集,文史方面就有



★★★★

花园文丛

陈垣、余嘉锡、朱师辙、启功等名家。当时辅仁的学生较少，师生关系也很融洽，所以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教师的悉心指点。在这一环境熏陶下，我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。大学期间，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唐以前的中国历史，毕业论文做的就是有关汉唐年号变化与政治关系的题目。一九四九年参加革命以后，我到华北大学接受南下工作培训，后来，被留在历史研究室当研究生，师从范文澜先生，开始转向近代史研究。一年以后，我奉调到南开大学工作，讲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、鸦片战争史、中国近代史和北洋军阀史等课程。虽然学术方向有所转移，但我并未放弃古代史。我一贯主张学术不但要古今贯通，还要中西贯通，反对学问越走越窄，这个我们下面再谈。北洋军阀史是我研究近代史的核心点，这要追溯到跟随范老学习的那个时候。当时研究室（新中国成立后改制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）接受了一百多麻袋北洋档案，在整理这批档案过程中，我开始接触北洋军阀史。那时的工作条件很差，每天在仓库里弄，尘土飞扬，每人只发一件灰布制服，一个口罩。整理工作分两步，第一步非常辛苦，就是先把土抖落干净了。因为那些档案都很多年没有动了，非常脏。我们早上去，晚上回来的时候，戴眼镜的镜片都是黑的，口罩遮住的地方是白的，可是口罩上两个鼻孔的位置也是黑的。全身都是土，弄干净后，把档案按文件类型分堆，再做大致的政治、文化、经济的分类，这就弄了近半年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整理的时



书前书后

候就很细了,要把每份文件看一遍,然后做卡片,写明这是什么时间,什么事情,写出概要性的东西,进行专题的内容分类。在研究这些档案的同时,我又看了一些有关的书籍,对北洋军阀史产生了兴趣,我认为这是治学中的“从根做起”。一九五七年时,湖北人民出版社向我约写北洋史书稿。当时没有人写相关专著,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,写成了十二万字的《北洋军阀史略》。没想到,出版后有一定反响,日本还出了两次译本。我当时自认为这是以马列主义观点写就的第一部北洋军阀史。一九五七年以后至七十年代末,因受形势影响,研究处于徘徊阶段,没有什么进展。进入八十年代,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向我约稿,希望增补《史略》。一九八三年面世的《北洋军阀史稿》就是在原书基础上重新扩充、修改完成的。《史稿》出版后,我仍觉得当时没有一部完备的北洋军阀通史是一个缺憾,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,遂又经过十余年努力,在几位同仁的协助下,写就一百万字的《北洋军阀史》一书。这本书获得了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。当时我自信心很强,认为五十年内很难出现其他北洋通史,因为这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著述。我在“文革”时受冲击,其中一条“罪状”就是因为研究北洋史,被人指为是专门研究坏人的历史,与反动派气息相通。可我觉得,历史是丰富和多样的,如果大家都去研究英雄烈士了,那历史的另一面谁来研究呢?这样的历史不就成了片面的,而不是完整和全面的历史了吗?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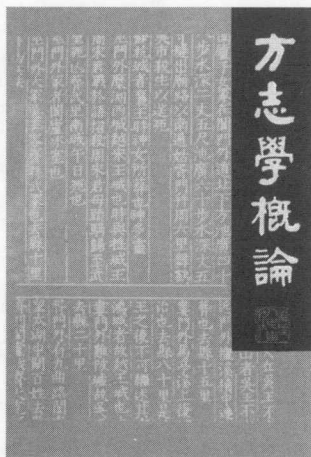
以上是我在历史学方面的研究情况。我的另一研究领域是目录学。我们读大学时,允许跨系选课,我就选了中文系的目录学课程,跟随余嘉锡先生学了几年。目录学难度较大,比较枯燥,要教好学好都不容易。作为老师,如果涉猎不广,积累不多,没有旁征博引的功夫,要讲得新鲜生动、引人入胜是不可能的。在极“左”时期,目录学属于“三基”,受到了批判,得不到应有的重视。直到八十年代时,我才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目录学的课程,后来因为身体原因,讲了两年多就没继续。我学目录学,是从《书目答问》入手的,读通了这本书,就掌握了两千多种古籍的大致情况,心中就有了作学术的纲领,无论你做哪个领域,都可以大致明了该领域内的基本书籍,再接触其他的书,就可以很容易地增补进这个体系中去。我现在正在总结自己在目录学方面的成果,明年中华书局将出版我的《书目答问汇补》一书。我在攻读目录学时,曾经做过《书目答问》索引,一种是从人名到书名,先列出作者,字号,属于哪一家,再列出著作;另一种是从书名到人名,先列出作品,属于四部中哪一部,再写出作者。通过制作这两种索引,就等于将《书目答问》拆散了又重组,学问就应该用这个做法。你们可以看看我早年手批手校的《书目答问》,那时我就用了这个办法。

除了上面两个方面外,地方志也是我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。在这方面,我的起步较早,因为我的祖父是民国《萧山县志》的独



书前书后

立纂修者，所以，我有一定家学渊源，也很想继承祖父研究地方文献的传统。四五十年代之交，我阅读了大量旧志。我国的方志有两千余年的历史，但志书的分布却不均衡，有的地方修得多，有的地方修得少，有的甚至没有，所以，解放初期，中央很重视纂修地方新志的工作，号召各地纂修自己的“地情书”。由于政治运动不断，新方志的修撰工作屡兴屡废，直到八十年代初，才掀起全国性的修志高潮。当时由梁寒冰先生负责主持全国的修志工作，我担任第一助手，由此进入到地方志研究领域。我在这个领域除写了《方志学概论》、《中国地方志》、《中国地方志通览》、《志域探步》、《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》等书外，还做了四点工作。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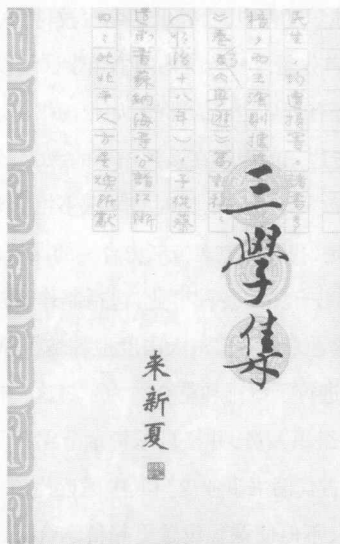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方志学概论》



先,是做了新志编修的启动工作,负责起草了全国新志编修规划和第一次启动报告。第二,是参与了若干新志的评审工作,给几百个县市区的方志写序,做了一些评论和纠谬的工作。第三,是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新志纂修人才。一九八二年时,我担任了华中、华北、中南、西北四个地区新志编修人员的培训工作。现在我的学生和私淑弟子遍布全国各地。第四,是倡导和参与了旧志的整理研究工作。我国是个志书大国,解放前编修的旧志就将近万种,不但存量,而且种类繁多,包括各级行政区划志、江河山川志、行业志种种。这些志书包含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等多方面的地方情况,是一个蕴藏量和信息量极为丰富的资料库,所以有必要进行相关的整理研究工作,以为现在社会所用。当时,我参与了旧志的目录编修、资料分类、内容研究和整体评价工作。

上述三个部分构成了我的学术体系,也就是别人讲的我的“三学”,所以我入选《南开史学家论丛》的集子就取了《三学集》的名称。到晚年后,我又想,干了一辈子学术,一辈子得到民众供养,如果只写了几篇供专业人士观看的文章,意义有限,所以,我就想把我的知识和才学还给民众。因此,从八十年代以后,我开始了学术随笔的写作。史学工作者所做的学术随笔,与作家随笔不同。我的随笔是以学术为根柢的,目的是给人更多的历史资料与信息,就算是针砭时弊,也是以历史为基础的。近三十年来,我一直坚持写随笔,已经出版了十余种随笔集。最近的一本,是中



《三学集》

华书局出的《皓首学术随笔丛书·来新夏卷》。所以,我觉得在我的“三学”之外,还有一学,就是学术随笔。以上就是我的学术研究概况。

○来先生,作为一位出色的教育家,您在图书馆学的建设方面体现了史学家的通识,您能补充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?

◎好的。我是历史系的教授,按照学校的安排,一九八三年,我离开历史系担任了南开图书馆馆长。一九七九年我曾创办了南开大学分校的图书馆学专业,一九八三年又组建了校本部的



图书馆系。在办学过程中,我提出了编写教材和引进人才的“两材(才)方针”。首先是改变传统的图书馆学课程设置。原先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程有重见迭出的弊病,如中国书史、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这三门课程在谈到图书的源流、分类、编目时都要涉及刘向、刘歆父子,所以,当时有学图书馆学要“七见向歆父子”的说法。于是,我就构想实施三史合一的课程,即以图书为中心,将涉及与图书有关的各种事业,包括制作、搜求、典藏、分类和再编纂等包容进来,不仅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原来三种课程的内容,而且重新进行了编排和整合。为了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,我就拟定提纲,组织人员,并亲自承担章节编写和删订通稿,先后完成了《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》和《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》的编写,应用于课堂,不但使课程设置更趋科学合理,而且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。为了建立图书馆学的基本框架,我还组织编写了一套有七种专业课程的《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列教程》,涉及图书馆学、文献检索、情报工作、国外图书事业等方面,使南开的图书馆学专业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。另外,我还增添了“中国书法”一课。有些人不理解,我的想法是一个图书研究者每天和书、文字打交道,也要做一些书写工作,所以,掌握书法的基础知识是很有必要的。从这门课开设后的情况来看,效果还是很好的。

○来先生,能谈谈您治学的心得体会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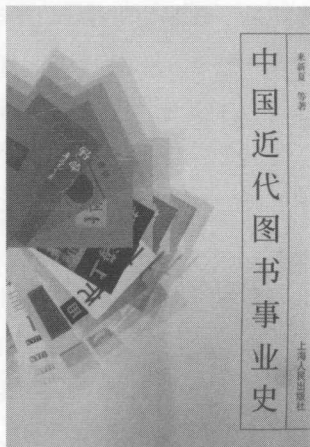
○好的,我想大致谈四点体会。首先,做学问一定要有基干,



书前书后



《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》



《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》

老话说就是“专攻一经”。无论你是搞哪一领域，先把这一领域内的重要书籍念透一部。我研究目录学，首先读的就是《书目答问》，一字一句的念，还将各家批注和相关资料汇总起来研究。我研究近代史，首先读的是三朝《筹办夷务始末》。因为近代史最重要的就是对外关系。在读书过程中，一定要做笔记，要会做笔记，不要怕麻烦，怕慢。读书快，但记得不牢，体会不深，快就等于慢；反之，细细研读，做了笔记，慢就等于快，这就是读书的快慢辩证法。年轻人不要自恃年轻聪明，记性好，一定要记得人总有老的时候，得来太易，失去也会太快。现在大家都用电脑，有好处也有坏处。我曾有一个“偏见”：没有“废话”的论文多是伪造，那都是



靠电脑下载拼凑的“学术百衲本”，没有自己的思想，没有价值。电脑下载是为秘书们伺候长官准备的“急就篇”，做学问不是攒书，不要搞这种“奶妈学术”，要注重根柢，不要做无根之木。

其次是要注重积累。现在学术界不重积累，这是受了社会风气浮躁的误导。特别是量化的评价标准，害死人。这是新八股的余毒，方便了评审，危害了学术。什么是好文章？能说清楚没有人说清楚的问题的就是好文章，十万字的是，五百字的也是。现在设立许多数量的杠杠，这是不合理的。要积累就要抄书，做笔记，要做到四勤：脑勤、眼勤、手勤、耳勤。不要光看，要调动多种途径。学英语有所谓“快乐英语”，不但要看懂，还要嘴巴喊着、耳朵听着，调动各种感官，才能有效果，做学问也一样。一定要善于写札记，这是做学问的一个重要步骤。在看书积累资料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抓住那些一纵即逝的思想闪光，要马上记下来，否则过后即忘，就是狗熊掰棒子，一无所得。我所说的“积”，就是广泛地搜集，“累”就是不停地增多。每天都要抄一点，记一点，这样“日积月累”，学问才能不断进步。你们一定要重视我国的成语，“聚沙成塔”、“集腋成裘”，这都是方法的总结，智慧的结晶，要深刻体会其中的精髓。抄书什么时候最难？打开书，抄第一条的时候最难。一定要沉住气，才能坚持下去。抄书不是盲目地抄，不是做印刷机、复印机，而是一个研究的过程。首先是点读，其次是分析，然后是记录思维的火花。所记的东西不一定很完善，但一定要把



书前书后

思想记下来。在此基础上,将同类的资料和看法归结成小堆,整理以后,写出三四百字的小札记。小札记写多了,再进行分类集合,就可以写出小文章。小文章积累多了,再加以整理,就可集成一部小书。在小书的基础上,再搜集,补充资料,就能写出部大书来。我的文章和专著大多都是这样写成的。所以说,读书研究一定要掌握“分合法”,先把读的书分开,再把它们合并,先分,后合,先有灰石砂土,才有高楼大厦。学文科的人一定要勤于积累。文科是很养老的,年轻时多积累,年老时就足够所用。二三十岁时一定要想到有一天会老,脑力体力不会永远旺盛,记忆也不会永远的过目不忘。你们不要被古人所欺骗,我非常反对“一目十行”的说法,这不是效率高,而是肤皮潦草。读书应当“十目一行”,一定要把书吃透。从“一目十行”到“十目一行”的转变很痛苦,但这是真有所得,而不是夸夸其谈。

第三点是一定要尊重传统,尊重前人的成果。所谓创新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,绝不是不尊重前人成果,自搞一套。要相信一点,历史是在很公正地筛选。那些经过历史考验保存下来的文献,必定有它的道理和价值。学术固然有愉悦自身的功用,但这样的“为己之学”只是学术的一部分,“为人之学”才是学术的根本立足点。我一直觉得,读书要做善举,我编著《清人目录提要》、《清人笔记随录》、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》等书,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我最近成书的《书目答问汇补》,汇总了各家批注和相关